



专家视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引领构建中的作用

□ 刘建飞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之中。十九大报告在外交部分开宗明义地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为人类作贡献的目标模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

政党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力量、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民意舆论的引导者，应当在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引领本国人民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主权国家仍然为基本国际行为体的时代，国家之间存在各种利益分歧是十分正常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广泛，世界的整体利益也越来越突出。人类已经成为一个命运攸关的集体。政党应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本党的意识形态，进而引领本国民众逐渐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促进本国政府的施政纲领趋向于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也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各国的施政纲领在促进本国发展、满足本国利益的同时，都必须关照世界的整体利益。各国的政纲都不应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相背离，而是要有利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推动本国政府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行为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组成单位，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传统的国际关系强调本国利益最大化，为此，或者导致同别国的对抗，或者寻求同某些国家结盟。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工程和根本途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以合作共赢为宗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上完全相通、相融。

积极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体系进化。一个国家如果存在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往往会向国际社会输出负外部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能量。政党应当促进本国政府采取适合本国国情又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对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能照搬照抄。只有能够推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的政党才会有生命力的政党；只有将本国发展与治理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的国家才是有前途的国家。政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已经紧密联结在一起。

冷静评估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定位

核心阅读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保护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维持和平”“提升美国影响”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分析了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阐述了美国国际战略的指导原则，提出了应对挑战的优先选项。它体现了特朗普强调的“美国第一”理念，凸显了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至上的执政原则，同时以“冷战思维”审视大国战略竞争对美国利益以及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这份报告对中国作出了新的战略定位，是观察和研判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走向最重要的战略性文件，值得深入分析与高度重视。

□ 陈积敏

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极为负面

自1987年以来，美国政府已发布16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之前此类报告相比，本次报告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最为负面。里根政府时期，缘于应对共同安全威胁的需要，中美之间实际上形成了“准同盟”关系，因而对中国的战略定位非常积极，称“美国寻求与中国发展紧密、友好、合作的关系”“一个强大、安全与现代化的中国符合我们利益”。老布什政府时期正值冷战终结之际，美国对华战略借重有所降低，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处于观察、调整当中，认为“如苏联一样，中国构成了一个复杂挑战”，但“与中国协商与联系是美国政策的中心特点”，同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兴起，支持、遏制或平衡中国兴起以保卫美国利益的需要”。克林顿政府共发布7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总的趋势是对中国认知越来越积极，从“发展与更广泛的接触”到“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开放与安全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再到“构建一个建设性美中战略伙伴关系”，层层递进。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又进一步发展，从小布什政府“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到奥巴马政府“我们欢迎中国与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在推进经济复兴，应对气候变化以及防扩散等优先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无论是小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其对华战略定位的总基调是共同的，即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当然，其间也提到中美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分歧，但均表示这并不妨碍合作，如小布什政府强调，“我们将努力减少存在的分歧，不允许分歧妨碍我们双方赞成的合作。”奥巴马政府认为，“虽然会有竞争，但是我们认为不一定发生对抗。”

然而，特朗普政府则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挑战者”“对手”。尽管“报告”也提及美国寻求与中国继续合作，但仅是只言片语，显然并非重点。不仅如此，特朗普

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双边互动，特朗普政府发现中国并没有在朝核问题上实现美国的预期目标，从而对中国逐渐失去耐心。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对外外交是基于实际利益基础上的“交易型”外交，中美关系的发展状态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皆由美国在与中国互动中是否实现了其主要战略目标来确定。此外，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严重失衡的现实、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并由此而迸发出的自信等这些现实，令美国战略界甚为担忧。特朗普强调“美国第一”，这不仅反映出他将奉行美国利益优先的执政原则，而且也反映出其战略目标，即确保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不受挑战。因此，美国不能接受被中国超越的任何可能性，哪怕仅仅是一种趋势，更何况这种趋势正日益变得不可阻挡。因而，这份打着“美国第一”旗号的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竞争者”也就不不足为奇了。

二是特朗普执政团队具有浓烈的民粹主义倾向与“鹰派”色彩。特朗普政府执政团队有三个主要特点，(1) 内阁成员富豪多，被称为“富豪俱乐部”；(2) 决策团队军人多，被外界评价为“军人政府”；(3) 多位阁僚具有民粹主义倾向，以至于有“民粹主义大本营”之称。可以说，特朗普政府实现了将资本、权力以及偏执思想三者融为一体，其结果便是咄咄逼人的进攻性外交政策。这个团队起草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权力政治这一现实主义立场来观察世界，其结果必然是敌我对立的二元观与零和博弈的竞争观。

三是为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民意支持度极低。美国主要民调机构调查数据显示，自就职以来，特朗普执政满意度未能超过半数，甚至长期在40%以下。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这是不可接受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为了提振士气，鼓舞人心，特朗普政府必须要渲染一种美国处于危机与挑战之中的场景，这样才能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团结在总统周围”的核心效应也因此而产生，这不仅可以满足特朗普个人的心理需求，而且还可以为2018年的中期选举聚集人气。特朗普在“报告”发布当天的讲话中便指出：“根据这一战略，我们呼吁美国再次大觉醒、重燃自信，让爱国主义重生以及让繁荣与骄傲重现。”在所有大国当中，能够激起美国人危机感的也只有中俄两个了：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当前挑战，而中国则对美国形成长远威胁。

辩证认知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定位

对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极为负面的战略定位，我们既需要重视，但也无须反应过度。之所以要重视，是因为该报告的战略重要性，它反映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对华关系中的一种主导性意见。尽管“报告”并没有具体的对华政策表述，但若依据这种主导性意见来制定与推进美国的中国政策，两国关系的发展将受到严峻考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尽管任职时间不

互联网金融企业出海东南亚要过“三关”

近期，一批以技术见长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加速布局全球市场，并不约而同地将东南亚视为出海第一站。在许多中资企业看来，当前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具备较大潜力与较高投资价值，东南亚与中国相对悠久的交往传统有助于中资企业以较小成本移植国内成功经验。“得东南亚者得天下”似乎成为现阶段中资金融企业的共识。

□ 苏瑞娜

在当前一片繁荣的景象下，互联网金融企业出海东南亚也潜藏着一些风险，如东南亚金融市场监管过严、中资企业难以融入当地环境等问题，更有舆论认为中资企业在东南亚遭受了明显的“市场准入”歧视，但这些外部阻力均非决定中资企业成败的核心要素。中资企业能否在当地站稳脚跟，关键在于企业自身实力是否过硬。整体而言，当前出海南东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无论是在商业模式、竞争能力还是对当地政策的把控上都存在着亟须克服的难关。

用户接入关

中资互联网金融企业布局东南亚市场时虽有并购、战略合作、技术输出等多种模式，但这些模式均未能妥善解决用户接入难题。以蚂蚁金服并购进场模式为例，蚂蚁金服母公司阿里巴巴先是收购了东南亚最大的在线购物网站Lazada，再将Lazada自有在线支付工具HelloPay与支付宝合并，进而尝试借助该网站的渠道将支付宝导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市场。蚂蚁金服在东南亚的成败取决于支付宝能否在当地市场扎根。但实际运营中暴露的问题是：支付宝虽接入Lazada平台，但仅是该平台13种支付方式中的一种，且具有

独立运营权的HelloPay并未被支付宝完全替代，加之当地网购群体支付习惯已经形成，最终反会造成支付宝缺乏用户使用而造成支付工具“空置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这种“自上而下”借并购进场的模式难以复制支付宝在国内发展的独特路径。蚂蚁金服金融业务的核心支柱是支付宝，而支付宝得以壮大的根本原因是解决了淘宝平台早期用户对在线支付信用担保的诉求。换言之，移动支付工具本身并没有价值，其价值依赖于支付工具接入电商平台时平台用户的使用意愿。支付宝虽接入了Lazada购物平台，但却不具备支付方式上的不可替代性，因而难以完全掌控该平台用户的使用意愿，这势必会影响蚂蚁金服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开展。其他互联网金融企业虽然进驻模式略有不同，但

也都面临着用户使用度不足、资金难以有效沉淀的难题。

市场竞争关

东南亚市场的增长潜力不仅引起了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关注，也吸引了全球互联网金融巨头的进驻。在东南亚市场上，中资企业将直面全球同行的竞争。以移动支付这一互联网金融的支柱性业务为例，支付宝、微信支付都要与Paypal等全球移动支付巨头直接竞争。在国内移动支付的竞争中，海外巨头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当国内企业参与海外竞争时，需要与国际巨头同台竞技，此时比拼的重点自然是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适应海外市场的能力。相比海外巨头而言，中资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略有欠缺，在参

与国际竞争时并不具备压倒性优势。

政策兼容关

关于国内互联网金融企业出海东南亚可能遭遇的风险，国内舆论担心的焦点集中在中资企业的企业文化难以适应当地营商环境，进而引发对中资企业的政策歧视。这是典型的以非金融类企业既有经验来推测金融类企业的市场风险。实际上，东南亚市场对中资金融企业并未有太多显性政策歧视，即便是对非金融类中资企业，东南亚市场的接受度也普遍较高。从管理成本上看，东南亚各国的行政、税务与金融系统很难针对中资企业设置特定的限定性政策，本质上，中资企业与其他外资企业都处于同一竞争环境中。限制中资互联网金融企业扎

根当地的关键因素是东南亚诸国金融体系自身的不完备，主要表现为东盟整体金融体系的碎片化。一方面，东盟内部缺乏系统的跨境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体系，这增加了中资企业开展金融服务的难度。另一方面，东盟内部金融体系不兼容情况较为突出。东盟诸国的金融体系各有不同，有些国家没有中央银行，完全依赖政府的政策调控，这不仅增加了区域金融系统对接难度，也加剧了金融系统的不可预测性。互联网金融企业依赖用户使用数量，对区域金融一体化要求较高，但东盟不同国家在基本的货币进出境、外籍账户资金划转上都有完全不同的政策要求，使得进入东南亚市场的中资金融企业需要建立“一地一策”的应对机制，这不仅增加了运营成本，也延缓了中资企业在东南亚扩

张的步伐。

要提升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出海成功率，首先就是改变观念、分清主次。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而言，最为关键的是解决用户接入难题。中资企业应优化当前“自上而下”的进场模式，将获取用户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先打牢移动支付的客户群体再图谋开展金融业务。其次，在东南亚市场上应先谋一域、再谋全局，在市场竞争中不断优化自身竞争力。长期以来，我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缺少与海外巨头硬碰硬的经验，在进入东南亚市场时应先谋求在小区域、细分市场上站稳脚跟。当前国内一些企业四面出击、同时布局多个国家的做法实非明智之举。最后，政府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在东南亚的实施落地，从“顶层设计”逐步推进到“底层建设”，全方位、多角度协助东盟实现区域金融一体化建构，让中资企业有机会参与东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其后的市场发展打牢根基。另外，中资企业出海东南亚，要学会“抱团”，不仅是企业与企业“抱团”、业务与产业“抱团”，更应是企业与政府“抱团”。互联网金融企业走出去，不但要业务走出去，还应是整个金融业务的政策支撑系统一并走出去，这就不仅需要企业主动加强与政府间的合作，政府更应主动提升自身政策的外部辐射力度，借区域合作搭建政策合作平台，推动企业在东南亚市场落地生根。



热点透析